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新移民的 居住隔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张延吉¹ 林钦熙² 王洁晶³

1.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2.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3.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新移民已成为中国城市社会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其社会空间隔离状况的认识仍局限于少数中心城市。全面测度2000、2010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域和市辖区范围内新移民的互动指数与隔离指数,发现该群体的居住空间由总体轻度隔离增至中度隔离,市辖区的居住隔离问题比市域范围更严重,隔离程度在一二线城市依次递减,在东部、中西部、东北地区逐步下降。“市场-制度”模型能较好解释上述隔离格局,经济发达城市中的高房价将以中低收入者为主的新移民基本排斥在中高档社区之外,国际资本扩张带来的社会极化进一步导致空间极化,而缺乏本地户口的新移民难以享受公共住宅等部分公共服务,加剧了居住隔离困境。

关键词: 居住隔离; 互动指数; 隔离指数 “市场-制度”模型

中图分类号: TU9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321(2021)04-0063-08

一、引言

居住隔离系指具有某些相同社会属性的居民毗邻而栖,隶属不同人群的个体相互远离、缺乏互动、彼此排斥的空间格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隔离形式包括种族隔离和阶层隔离。^[1]作为社会不平等在空间上的映射,社会空间隔离将导致弱势群体集聚区在经济领域面临就业机会萎缩和收入增长停滞,在政治领域缺乏政府投资和优质服务,在文化领域盛行反主流价值观和街头暴力风气,在社会领域丧失集体凝聚力和非正式控制力。^[2]为避免社会不平等陷入恶性循环,定期评估各类人群的空间隔离状况、变化趋势及其影

响因素已是欧美各国制定融合性公共政策的基础,也成为西方城市研究的热点议题。^[3]

从总体格局来看,美国城市中黑人与白人的居住隔离程度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位,亚裔、拉丁裔与白人的隔离程度略有增加^{[4][5]},欧洲城市的种族居住隔离程度则相对较低。^[6]由经济视角和制度主义构成的“市场-制度”模型为解释社会空间隔离状况提供了基本框架。作为市场经济视角的代表,空间同化理论认为,即便不存在制度性障碍或文化偏见,不同族群也会因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自动产生种族隔离,这在高房价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7]全球城市理论

收稿日期: 2021-03-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YJCZH258)

作者简介: 张延吉,男,上海人,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

林钦熙,男,福建漳州人,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洁晶,男,云南蒙自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指出,国际资本渗透及后福特制生产模式的引入使社会结构的两极化问题愈加凸显,拉大了跨国公司精英阶层与以移民为主体的低技能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社会极化会进一步加剧空间极化和居住分异,令城市社会空间日趋分化、碎化。这一规律不仅发生在全球城市,也存在于受全球化影响的其它城市。^[8]制度主义强调,公共政策及政府施政会直接影响居住隔离状况,如东欧国家实行的住房市场化改革降低了阶层间的空间融合^[9]、美国针对种族歧视性限制购房租房行为的行政禁令则有利于缓解族群隔离。^[10]

与西方社会不同,大部分中国城市由汉族人口占据绝对多数,且外国移民的数量极其有限,因此不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问题。但从改革开放至今,人户分离的国内移民规模逐步扩大,已成为城市社会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人群的空间隔离问题开始受到国内学者关注。从隔离程度来看,2010年广州市新移民与本地人的隔离指数超过了美国亚裔移民空间分异的平均水平^[11],同期深圳市新移民的隔离程度比广州还高。^[12]近年来,特大城市人口构成的多样性普遍上升^[13],但在北京、乌鲁木齐等地新移民与本地人的混居性变弱、群居性变强^{[14][15]},而两类人群在合肥的隔离程度却呈下降态势。^[16]上海案例表明,城市内部各圈层的居住隔离状况不尽相同,新移民与本地人在郊区比在中心城区更趋隔离。^[17]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出现的社会空间隔离现象是市场化机制与国家制度政策相混合的结果。^[18]城市政府将非本地户籍人口排斥在各类公共住宅的供给对象以外,加之多数新移民收入有限,只能集聚在低端的私人租房市场,于是形成了由大量外来人口构成的、相对孤立的城中村聚落。^[19]

然而,既有研究仅聚焦于北上广深等少数中心城市,不同文献的测算方法、分析单元、研究时点也各有差异。总的来看,学界尚未对我国各个城市中新移民的社会空间隔离状况形成全局性认识,无法全面开展跨城市的横向比较与历时性的纵向比较,难以对其成因进行系统性探索,制约了相关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为弥补上述缺憾,本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统一将街道乡镇尺度作为统计单元,以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年口径)为研究对象,逐一测度各省市域范围及市辖区范围内新移民与本地人的互动指数和隔离指数,以完整展现2000~2010年我

国所有城市中新移民的居住隔离现状。然后,基于“市场-制度”模型解释这一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检验经济视角和制度主义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

二、研究设计

(一) 隔离测度方法

社会空间隔离存在均质性(evenness)、接触性(exposure)、集中性(concentration)、中心性(centralization)和集聚性(clustering)等维度。^[20]其中,又以均质性维度(如D指数)和接触性维度(如P指数)最具代表性。^[21]相较于关注均质化分布程度的测量方法,接触性维度更能直接反映两类人群之间发生社会互动的概率,更为接近社会空间隔离的概念本质^[22],并在实证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23][24][25]}因此,本研究采用接触性维度中的两种核心指标,即互动指数(interaction index)和隔离指数(isolation index)来量化新移民的居住隔离状况。^[26]

较之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域范围,市辖区中各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关联更加紧密,为稳健起见,本文先后对市域和市辖区两个地理范围内的居住隔离程度进行测量。研究时点为2000和2010年,研究对象为2010年口径下的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对于2000年属于地区、2010年升格为地级市的城市,其2000年的市辖区范围参照2010年的行政区划。东莞、中山、嘉峪关等极少数地级市不设市辖区,因其面积较小,令这些城市市辖区的互动指数和隔离指数等同于市域值。

互动指数 xP^*y 旨在测度新移民 x 与本地人 y 的社会交往概率,取值范围为0~1。值越高,表示两类人群在城市中相遇的可能性越大。各市 xP^*y 的计算方法如公式(1)所示, x_i 、 y_i 、 t_i 分别指街道乡镇 i 的新移民数量、本地人数量、全体常住人口总数, X 为全市市域(或市辖区)的新移民总数, n 为全市市域(或市辖区)的街道乡镇个数。

$$xP^*y = \sum_{i=1}^n \left\{ \left[\frac{x_i}{X} \right] \left[\frac{y_i}{t_i} \right] \right\} \quad (1)$$

与之相反,隔离指数 xP^*x 反映新移民之间彼此相遇的概率,取值范围也为0~1,各市 xP^*x 的计算方法如公式(2)所示,参数与公式(1)相同。其值小于0.3,说明该市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轻;0.3~0.6表示存在中等强度隔离;大于0.6,则该市新移民面临严峻的空间孤立困境。

$$xP^*x = \sum_{i=1}^n \left\{ \left[\frac{x_i}{X} \right] \cdot \left[\frac{x_i}{t_i} \right] \right\} \quad (2)$$

(二) 计量模型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市场-制度”模型对各市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进行解释。在经济视角下,空间同化理论提出,发达城市的高房价排除了多数新移民入住中高档社区的可能性^[27];根据全球城市理论,国际资本涌入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极化和空间极化。^[28]因2000和2010年尚无针对所有地级市的平均房价数据,故以人均GDP作为代理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FDI)的自然对数被用于评价国际资本在各市的渗透程度。

在制度视角下,中国实行阶梯式的户籍管理制度,一线城市的落户门槛高过二线城市,二线城市又严于其它城市。没有本地户籍便无法申请公共住宅,使新移民更难融入本地社区。^[29]为此,本研究引入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二线城市(除广深以外的副省级城市、省会、天津、重庆)两个哑变量以反映落户难度,其它城市则为参照项。除了户籍制度,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分房制度对当代城市社会空间尚具影响,不依赖经济资本的分配方式有利于社会融合。^[30]尽管福利分房制度已被取消,国有经济占比仍是体现市场化程度的反向指标,本文亦将国企、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数占城镇常住人口数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

本文另以东北地区为参照项,纳入东部、中部、西部3个反映城市所在区域的哑变量。除哑变量外,其余变量分别按2000、2010年的市域和市辖区口径进行计算。考虑到省域内各市新移民的隔离程度可能受到一些共同因素干扰,使同一省份内不同城市间的干扰项具有相关性,因而采用OLS+聚类稳健标准误的方法拟合模型。由于存在 $xP^*y + xP^*x = 1$ 的数量关系,解释变量影响 xP^*y 和 xP^*x 的回归系数恰好正负相反,为

避免信息重复,回归分析时仅把 xP^*x 作为被解释变量。

(三) 数据来源

各市各街道乡镇的新移民、本地人和常住人口规模来自依“五普”数据发布的《中国乡、镇、街道人口资料》和依“六普”数据发布的《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资料》。其中,本地人系指居住在本地、且户口也在本地的人口,新移民则指人户分离人口,其规模由该街道乡镇的常住人口数扣除本地人口数获得。

在解释变量部分,地级市市域和市辖区的人均GDP来自《城市统计年鉴》,各类企业从业人数、外商直接投资额、2000年未成为地级市的地区及其下辖区的人均GDP源于《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城镇常住人口数来自《2000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三、新移民居住隔离状况

经计算发现(表1)^[31],2000年中国新移民在各市市域及市辖区的隔离指数均值分别达0.232、0.287,2010年增至0.317和0.381,互动指数则呈下降趋势。如上所述,隔离指数小于0.3表示轻度隔离,可见我国新移民的居住空间正由总体轻度隔离转向总体中度隔离。与美国的种族隔离程度^[32]相比,我国新移民的整体居住隔离程度低于黑人和拉丁裔人口,但略高于美国亚裔群体。而从变化趋势来看,较之美国黑人隔离指数的下降,以及拉丁裔、亚裔相对平稳的隔离指数^[33],中国城市新移民的隔离指数迅速攀升、互动指数大幅下降。反映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新移民的社会空间隔离问题日益突出,应当引起城市规划与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表1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新移民隔离指标均值

	互动指数 xP^*y 均值			隔离指数 xP^*x 均值		
	2000年	2010年	2010与2000年差值	2000年	2010年	2010与2000年差值
市域	0.768	0.683	-0.085	0.232	0.317	0.085
一线城市	0.436	0.340	-0.096	0.564	0.660	0.096
二线城市	0.628	0.527	-0.101	0.372	0.473	0.101
其它城市	0.790	0.708	-0.082	0.210	0.292	0.082
东部城市	0.725	0.629	-0.095	0.275	0.371	0.095
中部城市	0.793	0.714	-0.079	0.207	0.286	0.079
西部城市	0.778	0.689	-0.089	0.222	0.311	0.089
东北城市	0.798	0.749	-0.049	0.202	0.251	0.049
市辖区	0.713	0.619	-0.094	0.287	0.381	0.094
一线城市	0.429	0.332	-0.098	0.571	0.668	0.098

续表 1

	互动指数 xP^*y 均值			隔离指数 xP^*x 均值		
	2000 年	2010 年	2010 与 2000 年差值	2000 年	2010 年	2010 与 2000 年差值
二线城市	0.593	0.494	-0.098	0.407	0.506	0.098
其它城市	0.733	0.640	-0.093	0.267	0.360	0.093
东部城市	0.660	0.569	-0.091	0.340	0.431	0.091
中部城市	0.721	0.641	-0.080	0.279	0.359	0.080
西部城市	0.745	0.620	-0.125	0.255	0.380	0.125
东北城市	0.761	0.713	-0.048	0.239	0.287	0.048

中国新移民的居住隔离状况还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图 1、2)。

首先,2000 和 2010 年各市市域的平均互动指数高于市辖区,隔离指数低于市辖区,说明新移民在经济社会活动集中的市辖区面临更严重的居住隔离,这一现象在所有等级城市 and 所有区域中普遍存在。

其次,2000 年一线城市市域和市辖区的隔离指数均值分别高于二线城市 0.192、0.164,2010 年这一差距略微收窄至 0.187、0.162。其中,深圳市的互动指数始终位列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之末,

广州、北京和上海的互动指数也排在全国倒数前十位左右。2000 年二线城市市域和市辖区的隔离指数均值分别高于其它城市 0.162、0.140,2010 年该差距增至 0.181、0.146。统计显示,2000 年在 74.1%和 70.4%的省份(或自治区)中,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市域和市辖区的隔离指数位居全省(或自治区)第一,2010 年这一比例为 77.8%、59.3%。总之,除内蒙古等地的少数边疆城市或工矿型城市^[34]外,城市等级越高,新移民居住空间的孤立概率越大,与本地人的互动概率越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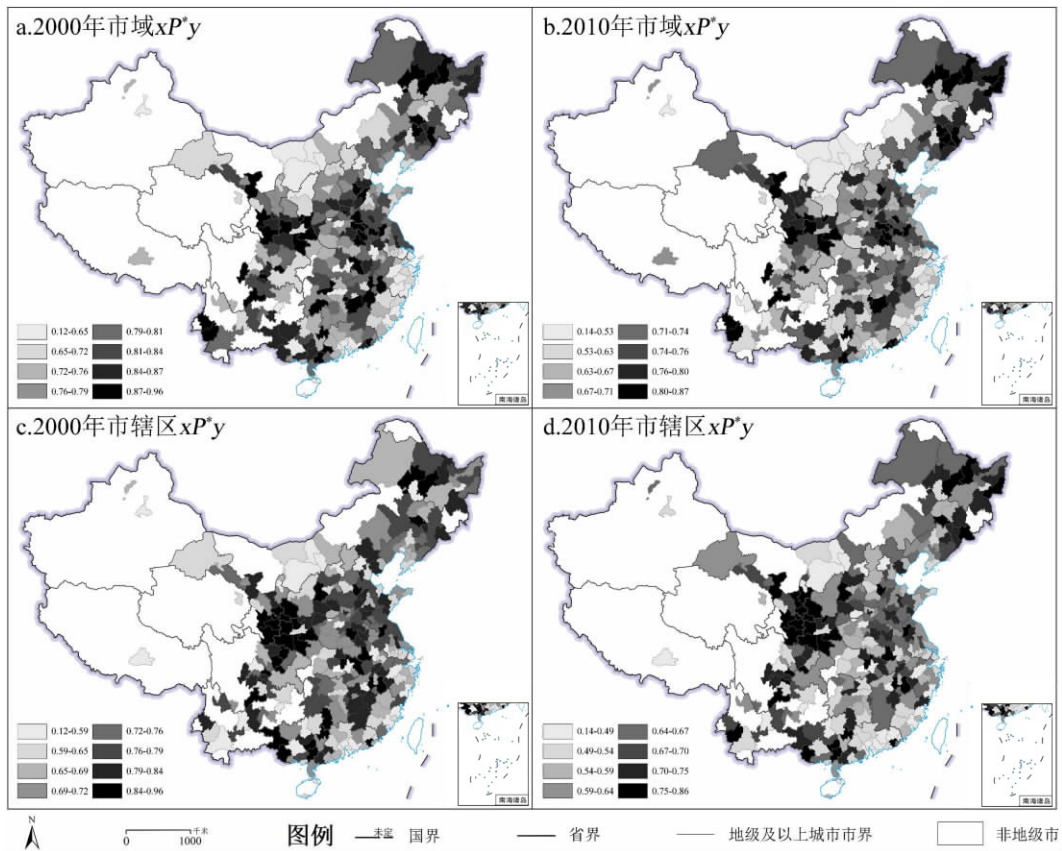


图 1 新移民与本地人的互动指数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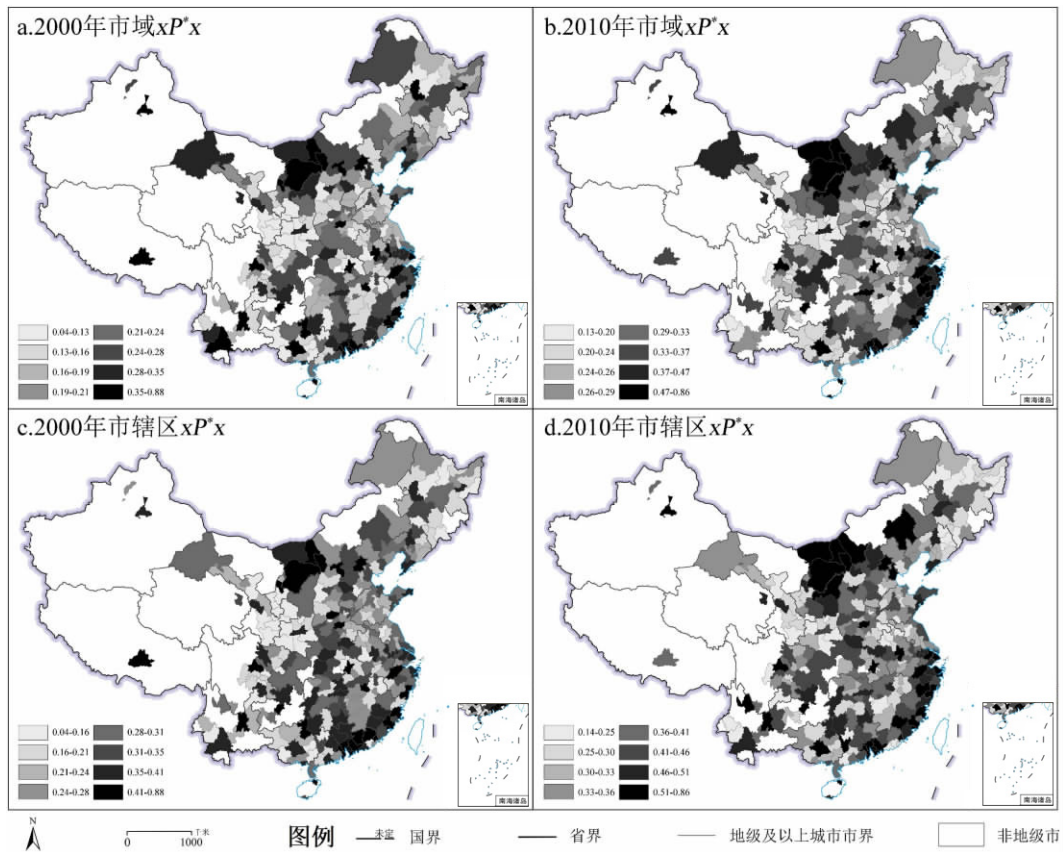


图2 新移民的隔离指数分布

再次,在区域格局上,200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城市市辖区的互动指数均值依次提高、隔离指数均值逐步下降。在2000年市域范围和2010年市域及市辖区范围内,西部城市的隔离指数均值超过了中部。不过,东部地区始终是新移民居住隔离问题最严重的区域。在隔离指数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东部城市约占13~14个;至2010年,在珠三角、长三角、海峡西岸等外贸经济发达、外来人口集中的城市群已形成明显的隔离高发连绵带。

最后,就变化趋势而言,十年间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互动指数平均降幅(即隔离指数平均增幅)几乎相当,且变化幅度大于其它城市。在市域范围内,东部城市的互动指数降幅最大;在市辖区范围内,西部城市的隔离指数增幅更大。

四、“市场-制度”的解释性框架

在描述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将利用“市场-制度”模型解释各市新移民居住隔离的形成机制,并检验以人均GDP及ln FDI为代表的经济视角和以城市等级及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制度视角的解释力(表2)。

从市场经济视角来看,人均GDP与新移民隔

离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关联。当保持其它因素不变时,2000年各市市域或市辖区的人均GDP每提高1万元,隔离指数将分别增加0.054和0.038;2010年该回归系数虽降至0.025和0.015,但仍在0.00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相较于欠发达城市,房价、物价等生活成本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更高,新移民在当地扎根安家的经济负担相应提升,而多数新移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教育技能欠佳、社会网络同质,无力承担在本地人较多、区位条件良好的老城区或中高档社区居住所需的各种费用,只能落脚于房价及房租便宜的城郊或城中村,于是逐渐形成了以新移民为主体、相对孤立的社会聚落。诚如空间同化理论所言,社会空间隔离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结果。

与之相似,外商直接投资额的自然对数也与各市新移民的隔离指数呈显著正向关系。若该市市域或市辖区的FDI增加100%,2000年该地的新移民隔离指数将相应上升0.007和0.008个百分点,2010年上升0.004和0.003个百分点。尽管解释力相对有限,但这一数量关系证明,全球城市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中国城市移民的居住隔离。国际资本的涌入和跨国企业的壮大孕

育出庞大的白领阶层,与此同时,后福特制生产模式创造出大量低技能、低福利、不稳定的弹性就业机会,这些工作基本由新移民从事。而因全

球化带来的社会极化会进一步引致空间极化,加剧新移民的居住隔离。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2000年市域 xP^*x	2000年市辖区 xP^*x	2010年市域 xP^*x	2010年市辖区 xP^*x
人均GDP(万元)	0.054***	0.038***	0.025***	0.015***
ln 外商直接投资额(万美元)	0.007**	0.008**	0.004*	0.003*
一线城市	0.227***	0.269*	0.209***	0.256***
二线城市	0.115***	0.073***	0.128***	0.125***
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就业比重	-0.121**	-0.119**	-0.327*	-0.365*
东部	0.019	0.036*	0.057**	0.031
中部	0.022	0.046**	0.039*	0.012
西部	0.049**	0.050**	0.068***	0.044*
常数	0.121***	0.164***	0.171***	0.127***
adR ²	0.449	0.475	0.573	0.401
F值	30.052***	32.978***	48.937***	24.91***

注:***、**、* 分别表示在 0.001、0.01、0.0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从制度主义视角来看,2000年一线城市市域及市辖区的新移民隔离指数比一般地级市高出0.227和0.269,2010年该回归系数为0.209和0.256,二线城市隔离指数超出一般地级市的幅度虽小于一线城市,其哑变量仍全部显著为正。这一结果是在控制了经济因素的前提下取得的,故一二线城市高企的隔离指数与这些城市存在的制度性障碍密切相关。当前,未能取得本地户口的新移民被基本排除在公共租赁住房、限价房、经济适用房等城市公共住宅的供给对象之外,在子女教育等居住配套方面也无法完全享受公平均等的公共服务。而各地落户门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城市等级,落户标准呈现阶梯式特征,一线城市落户条件最高,二线城市次之,一般地级市最低,这在客观上造成一二线城市中的新移民难以融入部分由本地人主导的居住区。上述情况在一线城市市辖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市辖区模型中一线城市哑变量的回归系数高于市域模型。

此外,各市国企、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越高,城市新移民的隔离指数会随之显著降低。尽管自1998年起福利分房制度已被取消,但城市国有经济占比普遍被视为市场化程度的反向变量。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在薪酬分配、福利制度、配套保障等方面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公平化倾向,一些单位甚至会在城市的较好区位为新移民员工配有宿舍或限价房;私营经济体制则大多秉持强烈的市场竞争导

向,为压缩利润赢得生存,雇佣了更多短工、临时工等未参加社保的非正规从业者,新移民员工的住房一般需要个人在住房市场上自行解决。这一发现也与东欧国家市场化改革加剧了社会隔离的结论相吻合。^[35]

五、结论与讨论

新移民已成为中国城市社会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新移民居住隔离状况的研究相对有限,基本停留在针对少量中心城市的碎片化认识阶段,现状模糊又进一步限制了对影响因素和社会效应的探索。为弥补这一文献空隙,本文利用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所有街道乡镇的“五普”、“六普”人口数据,逐一计算了2000、2010年各市市域范围及市辖区范围内新移民与本地人的互动指数和新移民的隔离指数。这是对我国城市社会空间隔离状况的一次初步梳理,有望为开展后续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

研究发现,2000至2010年我国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已由总体低度隔离增至中度隔离,新移民的居住隔离程度呈一二三线城市依次递减,东部、中西部、东北城市逐步下降的整体态势,至2010年东南沿海地区还形成了隔离高发连绵带。此外,新移民的居住隔离现象在经济社会活动集中的市辖区比在市域范围更为严重。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新移民涌入城市并且开始从事非农工作,但他们被愈发孤立在城市内部的特定区域,缺乏与本地人接触互动的机

会,这不仅会诱发贫困、歧视、暴力、犯罪等次生社会问题,还使学习缄默知识、增加城市归属感、拓展社会网络、增进人际互信、融入主流生活变得愈加困难,而这些社会化环节恰恰是能否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尽管形式各异,社会空间隔离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专有现象,新移民的居住隔离困境已是中国各级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特大城市治理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研究表明,由空间同化理论、全球城市理论、制度主义理论构成的“市场-制度”模型适用于解释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空间隔离状况。从市场经济视角来看,经济越发达、平均房价越高、生活成本越大的城市会形塑出等级化的空间分异结构,让以中低技能和中低收入为主体的新移民不得不选择在价格洼地的社区中居住。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极化则会进一步促进空间极化,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全球化的影响并未局限于一二线城市或东部地区。从制度主义视角看,尽管户籍制度改革加速推进,但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公共服务供给,尤其是公共住宅和居住配套的区别化供给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一二线城市的落户条件依然偏向少数高知群体,大量新移民只能租住在城中村或低收入社区。总之,市场经

济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风险,而绝大部分新移民的住房问题尚未得到制度层面的充分关注,居住隔离正是这一社会运行机制在空间上的投影。

研究认为,应当全面评估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对我国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在以效率优先的原则下更加重视分配问题,更好地发挥城市政府的托底性职能。为抑制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恶化的新移民居住隔离问题,需尽快将新移民的住房需求纳入社会规划和城市规划的编制内容,加大小户型住宅供给比例,弱化户籍在公共住宅申请标准中的权重,推广商品住宅与公共住宅的混合配建模式,探索实施包容性的城中村更新方法。^[36]

受篇幅和数据所限,还存在如下局限:第一,在人类活动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居住隔离只是社会空间隔离的形式之一,基于真实活动空间的新移民隔离状况有待厘清。^[37]第二,本文仅从接触性视角测量隔离程度,未来可基于均质性、集聚性等不同维度系统揭示社会隔离的空间格局。^[38]当前,各街道乡镇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即将发布,大数据的挖掘与运用方兴未艾,有望为拓展跨时点、高精度的社会空间隔离研究提供更好的基础。

注释:

- [1] Wong D.W.S., “Spatial indices of segregation”, *Urban Studies*, vol.30, no.3(1993), pp.559-572.
- [2] Beaulieu M., Continelli T., “Benefits of segregation for white communit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vol.15(2011), pp.487-507.
- [3] 陈玉洁、李紫晴、丁凯丽,等《国外城市研究期刊近年研究热点及趋势(2010-2017年)——基于 Citespace 的计量研究》,《国际城市规划》2020年第4期。
- [4] [33] Massey D.S., Rothwell J., Domina T., “The changing bases of segre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626(2009), pp.74-90.
- [5] [32] Logan J.R., “The persistence of segreg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metropolis”, *City & Community*, vol.12, no.2(2013), pp.160-168.
- [6] Musterd S., “Social and ethnic segregation in Europe: Levels, causes, and effect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vol.27, no.3(2005), pp.331-348.
- [7] [27] Iceland J., Wilkes R., “Does socioeconomic status matter? Race, class,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ocial Problems*, vol.53, no.2(2006), pp.248-273.
- [8] [28]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9] [35] Ljunggren J., Andersen P.L.,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egregation: Spatial class divisions in Oslo, 1970-200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39, no.2(2015), pp.305-322.
- [10] Ross S.L., “Turner M A. Housing discrimination in metropolitan America: Explaining changes between 1989 and 2000”, *Social Problems*, vol.52, no.2(2005), pp.152-180.
- [11] 李志刚、吴缚龙、肖扬《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地理研究》2014年第11期。
- [12] 吴蓉、潘卓林、刘晔,等《深圳市新移民社会空间分异》,《热带地理》2019年第5期。

- [13] 禰铃沂、龚岳、李贵才:《中国特大城市居住分异特征与演化研究:2000-2015》,《城市问题》2020年第2期。
- [14] 冯健、周一星:《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地理学报》2008年第8期。
- [15] 雷军、张利、刘雅轩:《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干旱区地理》2014年第6期。
- [16] 李传武、张小林:《转型期合肥社会空间分异与重构(1982—2000)》,《人文地理》2015年第5期。
- [17] 肖扬、陈颂、汪鑫,等:《全球城市视角下上海新移民居住空间分异研究》,《城市规划》2016年第3期。
- [18] 慧,Chen G.,等:《基于小尺度五普数据的南京旧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地理科学》2013年第10期。
- [19] [29] 袁媛、许学强:《广州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及影响因素研究》,《人文地理》2008年第5期。
- [20] [26] [38] Massey D.S., Denton N. A., “The dimension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ocial forces*, vol.67, no.2(1988), pp.281-315.
- [21] Reardon S.F., O’Sullivan D, “Measures of spatial segregatio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vol.34, no.1(2004), pp.121-162.
- [22] Shihadeh E.S., Flynn N., “Segregation and crime: The effect of black social isolation on the rates of black urban violence”, *Social Forces*, vol.74, no.4(1996), pp.1325-1352.
- [23] Lee M.R., Ousey G.C., “Counterbalancing disadvantage?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and urban black homicide”, *Social Problems*, vol.54, no.2(2007), pp.240-262.
- [24] Feldmeyer B., “The effects of racial/ethnic segregation on Latino and black homicid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10, vol. 51, no.4(2010), 600-623.
- [25] Barranco R.E., “Latino immigration, interaction, and homicide victimization”, *Sociological Spectrum*, vol.33, no.6(2013), pp.534-553.
- [30] 李志刚、吴缚龙:《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地理学报》2006年第2期。
- [31] 2000、2010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域和市辖区的互动指数与隔离指数可从如下地址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N8KVAPv_CHpVTqU84f_Qpw。
- [34] 内蒙古等地的新移民隔离程度偏高,系因一些工矿区(如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包头的包钢厂区)、旅游区(乌兰察布的岱海旅游区)、文教区(如巴彦淖尔的沙漠实验中心)集中了高比例的人户分离人口,这些孤立的“飞地”拉低了互动指数、拉高了隔离指数。
- [36] 叶裕民:《特大城市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理论架构与机制创新——来自北京和广州的考察与思考》,《城市规划》2015年第8期。
- [37] Kwan M.P., “Beyond space (as we know it): Toward temporally integrated geographies of segregation, health, and accessibil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103, no.5(2013), pp.1078-1086.

[责任编辑:黄艳林]